

西方关于移民参政的几种理论阐释*

朱陆民

(湘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 移民的政治参与是一个典型的跨学科课题。从西方现有文献看,西方学者关于移民参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影响、制约不同移民集团参与其居住国政治的因素的探讨上。本文则主要从移民的族群或文化特征、社会经济地位和移民居住国的制度三种不同视角对影响、制约移民政治参与的因素做了理论分析,并分别对它们作了初步的理论归纳和总结。

关键词: 移民;政治参与;西方;理论阐释

中图分类号: D52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529(2004)06-0087-05

无疑,移民的政治参与是一个典型的跨学科课题。或许正因为这一原因它才成为国内学术研究领域的一大盲点。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学界对移民参政的研究却已达到了相当的理论高度。在移民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探索、挖掘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对于推动国内对该课题的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从现有文献看,西方学界对该课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影响、制约移民参与其居住国政治的因素的探讨上。笔者则试图主要从移民的族群或文化特征、社会经济地位和移民居住国的制度三个不同的视角对影响、制约移民政治参与的因素作理论分析。本文分别对它们作了初步的理论归纳和总结。

一、族群或文化的视角

根据研究民族和民族主义的著名英国学者安东尼·史密斯的界定:“族群是一个具有名称的有着共同祖先和传说、共同的记忆和文化因素的人群;一种与历史的领土或家园有关的联系;一个团结的度量。”^{[1](P28)} 族群一词中有中文的“人种”的因素,但它主要是一个文化概念,共同的文化渊源是族群的基础。族群或文化作为一种理论分析工具,一直是西方学者研究东南亚移民的主导方法。它假定,作为独特的族群或宗教集团重要特征的移民身份对于理解他们在其居住国政治过程中的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理由是,现实中,移民通常是依族群为界来组织和表达其政治利益的。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领域,大量的矛盾和冲突都可以归入族群或文化的类型,如科索沃战争,印度的动荡以及北爱尔兰的冲

突与斗争,等等。这些矛盾和冲突无不向世人表明理解族群身份意义的持久的重要性。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定居点研究中心主任阿普罗迪齐奥·A·拉齐安说:“在多数亚洲社会里,正式和非正式的联合都倾向于围绕民族的特性和群体组成。”^{[2](P56)} 莫里斯·弗里德曼和劳伦斯·克里斯曼等学者通过对海外华人稠密的宗亲联系网络的深入考察后断言,整个东南亚的华人社团组织都是以发现于中国大陆的相似团体为基础而建立的,他们有着独特的“华人”特征。如在马来西亚,华人不仅一直保持着其有别于其他族群的“华人”身份认同,而且在华人社会内部还广泛存在着各种为经济、社会和政治目的而建立的华人社团组织。^{[3](P478-480)} 海外华人社会存在各种各样的社团组织不假,但它们是否都以中国大陆的类似团体为基础呢?有学者对此种观点提出了质疑。如美国政治学者艾米·弗里德曼就认为,虽然中国农村生活,特别是1949年前的农村生活的确是围绕着世系血缘来组织的,但对于城市或贸易地区而言这一论断无疑有失真。况且,在这些宗亲联系网络重新创建的地方,以及它们在社区管理或充当华人社会与其居住国的中介人所起的作用等方面存在着广泛的变化。^[4] 这一切均与中国大陆的情形相去甚远。温泽勒等学者也认为,事实上华人组织依被研究国家的不同而有相当大的差异,不论该组织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而且华人组织还因华人社会同主流社会的文化适应程度的不同而不同。例如,马来西亚甲兰丹农村的华人社团,它们在数量上相对较少且更多地发挥社会经济作用而非政治或中介作用。^{[5](P141)}

* 收稿日期: 2004-06-15

作者简介: 朱陆民(1968-),男,湖南汝城人,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暨南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研究生。

在华人同主体族群融合程度较低的地方,华人组织倾向于从居住国政治体系中获得更大的自主权,并且在社区内部拥有较大的支配力量。仅此而论,族群因素对华人组成社团的范围和活跃程度的影响远比其他变量小。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路辛·派伊是西方政治文化研究领域成就卓著的学者,对于文化的政治功能他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在他看来,政治、领导人及其追随者的作用在文化上取决于人们关于权力性质的看法或信念。他考察了亚洲若干国家关于权力和国家起源在认识上的差异后指出,亚洲人常常将权威理想化,亚洲特色的文化模式既可能有助于其现代化进程也有可能阻碍其现代化进程。^{[6](P23-45)}他同时认为,亚洲的依附性文化再生产一种孩子般的状况,在这种状况下人们对权威和引导的需求使得权威主义统治“更加持久”、“更可忍受”^{[6](P329)}。这对移居他国的亚洲移民的政治行为往往产生持久而深刻的影响。在论及马来西亚政治时,派伊说,族群问题已经在马来西亚产生了一个脆弱的政体,在这里,政府的基本规则是避免可能激发人们愤恨情绪的争论。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不同种族之文化冲突的结果。派伊视华人文化与马来人文化是两种相互对抗、敌对的文化,因为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应对焦虑、权力以及权威。他认为,不论是东南亚还是美国,华人组织都倾向于保护其成员免遭社会上其他人的伤害。由此,海外华人在政治上难以动员的原因就由华人社会领导人的文化上的内向性而得到了诠释。^{[6](P251-252)}在他的研究中,派伊对他所认为的对政治组织起重要作用的每个族群的文化特性表现出极为浓厚的兴趣。在他看来,正是华人的这种文化特性导致了他们在其居住国作为配角地位的永久化。文化通过影响移民对政治的认知而影响他们对政治参与的不同态度,从而决定他们以何种方式参与政治,是主动参与还是被动参与,是积极参与还是消极参与,等等。

挪威著名人类学家弗里德里克·巴思在其对族群的研究中,提出了关于族群文化与族群成员政治性位置关联的不同看法。他的研究重点从过去对各个独立族群的内部建构和历史转向族群的边界和边界的维持。这是研究族群文化的一种不同的视野。针对人类学家R·纳鲁尔关于族群的定义,即族群用以指明一群人:^{[7](P17)}1. 生物上具有极强自我延续性。2. 共享基本的文化价值,实现文化形式上的公开的统一。3. 组成交流互动的领域。4. 具有自我认同和被他人认可的成员资格,以形成一种与其他具有同一阶层的不同种类。^{[7](P17)}1965年,巴斯在《族群与边界》一书中指出上述四个要素中的关键之点是“自我归属和由他人归类的特征”。以此为着眼点,巴思提出了他的“族群边界”理论。该理论认为:“一种归类方式是一个族群归属,即是由于个人的背景和渊源所决定的最基本的、最普遍的认同。在一定程度上,为了互动,成员们用族群认同去给他们自己和其他人分类,他

们在此组织意识上构成了族群。”^{[7](P18)}在他看来,文化不是静止的,它是一个因变量,在这里,是边界界定族群,而不是它所包含的文化。巴思的观点中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文化价值与习俗本身不会对政治行为产生多大影响,而是对待族群之间的差异的方式影响政治行为。每个族群的参与模式都是从其居住国的社会化过程中发展而来的,而不是直接从母国输入的。

从族群或文化的视角出发探究移民政治参与的一个更具说服力的观点是,族群性往往为政治精英操纵而成为其动员移民卷入政治实现精英政治目的的工具。那么,这种族群性是什么呢?在戴维·布朗看来,族群性就是族群成员的族群依恋。正是族群的这一特性使族群获得了潜在的“复原力”,在利益的驱动和政治精英的动员下它往往会被激活从而转化为族群成员的现实政治行为。因此,与其他学者的观点不同,布朗不认为族群性要么是一种原生的司空见惯的现象,即认为一个人的族群传统对他或她之为人的品质和特性总具有本质的或初发的(亦即根本的)意义。据此,个人及人类群体间的族群差异,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化差异,都被视为根本性的差异。要么是一种情境(或社会)建构,即认为族群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它产生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目的是为了群体的界定、区分、凝聚和排他,族群差异因此并不被视为是根本性的。^{[8](P70)}他认为,正如思想意识形态常常提供人们某种心理帮助一样,族群依恋亦源于其提供人们心理帮助的能力,它常能提供人们某种心理规范,而这种心理规范有助于缓解国家—社会关系的不确定性。“这种关于族群依恋的心理力量的解释为理解普遍的常常把宗亲神话的每个心理机制转化为各种合法的象征的族群民族主义的政治思想诉求提供了基础”^{[9](P9)}。简单地说,族群特性能够被政治精英操纵用于动员人们参与族群民族主义运动或者它能够培育这样一种理解,即在社会内部那种以族群为界的分裂是“自然的”。战后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20世纪末席卷全球的民族分离主义浪潮为此种观点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二、社会经济地位的视角

以社会阶级为基础的分析方法把移民集团的社会经济地位看作决定移民集团在政治领域中参与和影响的独立变量。这一研究取向大致包括三种不同的观点,即分别强调移民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移民地位的边缘化和移民的集团意识对移民政治活动的影响或制约。

绝大多数美国政治文献关于谁参与政治的研究认为,参与政治的人往往是那些具有较高教育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这种看法的一致性极为引人注目,并成为众多政治学者借以研究影响移民参政因素的重要理论分析工具。维巴和尼的研究发现,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决定其参与

政治的多寡,而个体的参与程度受他们的市民态度、观点和相关制度结构的干预作用的调节。^{[10](P13-14)}这一研究成果现已成为美国政治参与研究的经典。约翰·霍顿对加利福尼亚蒙特雷公园市的美国华人社会日益增长的政治活动的研究表明,经济与人口的变化对新客移民和业已定居者之间政治关系有明显的影响。他发现,在蒙特雷公园市,随着接受过良好教育和富有的亚裔美国人人数的增加,他们在当地政治中的权力也越来越大。^[11]

在对美国犹太人的政治经济活动的研究中,巴德注意到,尽管在美国人口中所占比例很小(3%或低于六百万),但从总体而言,犹太人在经济上相当富有且投票参与率高于其他任何种族集团,他的结论是,经济地位变量在犹太人成功的政治活动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12](P59)}

卡斯尔斯等学者则强调移民地位的边缘化对移民参与政治过程的影响。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框架论证资本主义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这一移民的拉力因素如何导致一个由被边缘化的新客移民组成的下层社会的形成。移民的被边缘化因而决定着移民对政治的介入或缺乏。为支持他们这一观点,斯密特和海斯勒对移民群体如何经常在当地人所鄙弃的工资微薄、艰苦肮脏甚至危险的职业岗位上从事着生产和劳动进行了详尽地讨论。^[13]塞尔尼等新马克思主义者还将移民政治参与看作当地劳工和外来劳工寻找基于相似阶级利益的共同基础这一过程的一部分。换言之,当移民群体找到了同其他集团的共同事业的时候,他们将被动员起来参与政治过程,以维护自身利益。^[14]而这种理论的一个典型分析是艾尔兰所说的“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紧张与矛盾冲突中发现了移民政治的起因”^{[15](P6)}。它假定移民社会的组织类型的构建将与新客移民在相应的经济等级中的地位一致。因为移民群体往往愿意组成跨种族组织以便克服占优势的种族集团潜在地实施“分而治之”的策略从而赢得影响。在艾尔兰看来,在这些政治分析中,种族、民族抑或移民地位只不过是一种表层的范畴,藉此,国家能够把劳动阶级划分成为各种集团,因而,“商业与国家战略决定种族与阶级意识是相互冲突抑或相互强化,并决定哪种政治策略是必要的”^{[15](P6)}。

此外,持这种分析方法的学者还认为,移民的群体意识具有非常强烈的阶层特点,它有助于移民的政治参与。米尔波拉斯虽然同样对社会经济地位与政治参与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作了广泛的探讨,并区分了14种不同层次的政治参与形式,并认为地位较高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更可能把参与政治看成是公民的责任,而具有这种责任感的公民事实上会更加踊跃地参与。^{[16](P86-87)}但与此同时他似乎更看重某种团体意识对参政的激励作用。他发现,那些对社区事务积极的人更倾向于在政治上也表现出积极。鲍勃和吉列姆后来关于族群与社会政治参与的研究也发现,集团意识常

常激发其成员出色的参与,即便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社区内也是如此。^[17]安东尼·奥罗姆认为,正如社会经济地位或更广的社会阶层一样,族群性具有非常强烈的阶层特点。这一特点常常成为对公民政治参与有相当兴趣学者们在经验和理论研究(特别是研究美国政治)中值得考虑的课题。在一项调查黑人和白人政治参与程度的比较研究中发现,由于被置于不平等地位而引起的族群意识导致了美国黑人比白人有较高的参与比例,而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就是在族群地位不平等的情形下(在美国种族等级制事实上将黑人置于较低的地位上,目的是使黑人与同地位的白人相比,只能获得更少的政治参与机会),政治参与为黑人和白人提供了不同的功能。对于白人来说,政治参与,特别是组织参与,起到了提高声望的作用;而对于黑人来说,政治参与则是用来增强团体意识,为整体的黑人团体提供一个重要的群体功能,使得他们在社会环境对种族共同体不利的情况下能保持团结一致。奥尔森的经验调查也显示,同处于类似社会经济地位的白人相比,黑人的政治参与的比例更高些,其原因在于黑人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增强种族共同体的独特意识。而那些对黑人社会具有较高认同性的黑人与在他们种族团体中只具有较低认同性的其他成员相比,他们的政治参与比例往往要高些。^{[18](P289)}有关黑人种族意识和政治参与比例之间的联系类似证明也反映在维巴和尼的研究中。^{[10](P157-160)}

三、制度的视角

从制度的角度进行分析的方法强调移民居住国的制度和结构对移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一种正式的人为设计的影响社会相互关系的限制。在西方学术界,对制度的较为全面的理解来自彼得·霍尔和罗斯玛丽·C·R·泰勒在《政治科学和三个新制度主义》一文中对制度所作的历史制度主义的界定,即制度是扎根于政体的组织结构或政治经济中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程序、惯例和规范等,包括宪法规则、官僚标准的执行程序,制度本身就是一个行为主体。^{[19](P397)}它既包括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规的正式约束及其实施机制,又包括非正式约束,其核心实际上就是将传统的国家与社会联系起来,制度框架和网络结构。在制度主义者看来,正是这一制度框架和网络结构深刻地影响和制约着移民的政治行为。

制约移民参政的制度因素,首当其冲的是移民居住国的正式约束,主要是移民居住国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它们“既塑造又限制了移民选择的可能性”^{[20](P22)}。艾尔兰强调,某些移民政策、公民权法、选区的划分以及行政管理实践似乎可能导致各种独特的移民集团活动。艾尔兰运用制度分析方法对法国和瑞典的移民政治融合进行了解释。认为,理解移民政治的关键变量是理解移民居住国的制度是如何制约

移民的组织建构的以及又是如何对它做出反映的。^{[15] (P245)} 迈伦·维纳和莱廷还对制度的影响过程进行了具体地剖析。

在考察公民权资格的过程中,迈伦·维纳发现法律和制度塑造移民政治活动的力量是非常明显的。通过考察公民权的给予是以出生地为基础还是以血统为基础的。迈伦·维纳发现,当以血统为标准时,移民则未被给予同原住民相同的对土地、就业、教育或政治权力的正当要求。例如,在马来西亚,原住民优先的观念在国家宪法和法律体系中被视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种思想观念塑造了国家对外来者所做出的反应。因此,华人被看作是对马来西亚主导文化(主体民族马来人文化)的一个威胁,由此而来的政治体制的设计使华人在统治联盟中的有限作用制度化。^[21] 莱廷认为,华人社会的政治参与可以被理解为居住国制度结构的产物,而且它往往受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精英和华人社团领导人对华人的战略动员的影响。不过,他认为这些因素并不必然独立于其他因素而发挥作用,如文化、阶层以及历史机遇等。如一个集团组织集体行动时,作为一个整体的连贯的投票或游行示威的能力可能与该集团所持的某种世界观是联系在一起的。然而这种世界观本身对该集团的行为并不产生直接的影响。^{[22] (P67)} 相反,该集团成员的态度和选择权可能要通过制度来调节。

移民居住国错综复杂的非正式约束是广泛影响移民参政的另一类重要的制度因素。首先,移民所处的社会网络中的成员资格能够为移民参政提供激励。罗森斯通和汉森考察了美国政治并提出了关于谁参与、何时参与、为何参与以及怎样参与等一系列问题。在特定环境下,参与本身会呈现出一种集体利益与选择利益的结合。而特定的政治环境对于引起政治参与又是必要的。社会网络中的成员资格能够创造选择性报偿,因而有助于克服与非参与相伴而行的“理性忽视”。这些社会网络能够为政治利益而被动员起来,而动员本身是一种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以诱导人们参与政治。以政治家、政党、利益集团以及社会活动家而言,进入社会网络使得动员成为了可能。没有那些集团中的成员资格所提供的选择性利益,政治家就只有集体回报那些参与者。而对于政治领导人而言,总是以所有人为动员目标是没有必要的,因而决定以谁为动员目标的战略估算就能影响甚至可能决定谁参与以及何时参与。^{[23] (P18-35)} 由此,了解这种体制中的制度结构和官员的需要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某些特定集团可能被动员而其他集团则被忽视。此外,从功利主义的观点看,投票从根本上讲并不是一种理性的决定,^[24] 因为无论是选举投票、竞选赞助还是参与集会,这一切从利益报偿的角度看均未给参与者多少承诺。既然如此人们为何要参与呢?究其原因,是团体的成员资格在发挥作用。乌拉纳的研究暗示,团体的成员资格在个人决定投票时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所带来的消费利益使得参与投票的行为变得非常

理性。例如,一个人可能出席一个政治会议是因为某个同辈教会成员发起了这次会议,或者某人可能投票是因为村里长者催促他或她这样做。^{[25] (P390-422)} 而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是该教会、该村子的一员。可见,移民所处的社会网络中的成员资格为移民参政提供激励,从而增加了移民参政的可能性。

其次,社会化机制对移民的政治动员有重大影响。温迪塔姆·乔在他关于社会化机制的重要性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尽管地位变量,如年龄与教育为政治参与提供了技能,但它们可能是不及一个人经历的社会化过程有力量的因素。他分析了美国日益增长的异族人口的投票参与率,指出由于新客移民群体处于各种不同的社会化力量的作用之下(不同媒介渠道,市民或社团组织、娱乐消遣,等等),收入水平,年龄或受教育程度等指标可能与选民参与投票不会有太强的关联性。^[26] 由于社会化过程可能不同,而社会化又是决定一个人从参与投票中获得满足或利益的机制,因而投票参与率因团体的不同而不同是不足为奇的。

最后,移民社团组织及其领导人对移民参政的影响。存在于移民集团内部的社团组织体系的性质会往往对社团组织的目标及社团组织对主流社会的关注产生重大影响。假如移民社团组织的功能集中在社团内部的纠纷调解上而不是集中在同主流社会的融合上,那么政治参与将是微乎其微的。反之,如果移民社团组织在主导政治结构与满足移民集团内部成员的政治经济需要之间发挥着日益增大的桥梁作用,那么,移民政治参与的可能性就会广泛增加。

参考文献:

- [1] Smith Anthony D. *The Ethnic Sources of Nationalism, Ethnic Conflic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 [2] [加拿大] 阿普罗迪齐奥·A·拉齐安. 多族群和多文化的城市:亚洲视角[J]. 国外社会科学, 1997, (1).
- [3] Freedman, Maurice. "Overseas Chinese Associations: A Comment."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3, (1962b).
- [4] Freedman, Amy. *Politicization and Influence in Chinese Communities Overseas: the United States, Indonesia, and Malaysia*, Ph.D. disserta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1998.
- [5] Winzeler, Robert L. "Overseas Chinese Power,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Ethnicity in Southeast Asia: An East Coast Malaysian Example." In *Ethnicity and Ethnicity Relations in Malaysia*, Lee, ed. Center on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Occasional Paper no. 12, 1986.
- [6] Pye, Lucian W.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The Cultural Dimension of Authority*. Cambridge[M].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7] [挪威] 弗里德里克·巴思. 族群与边界(高崇译)[J].

-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9,(1).
- [8] [美]马克·C·伊兹.是本质还是社会产物?(郭长江译)[J].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5).
- [9] Brown, David. *The State and Ethnic Politics in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 [10] Verba, Sidney, and Norman H. Nie. *Participation in America: Political Democracy and Social Equality*.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2.
- [11] Horton, John. "The Politics of Diversity in Montary Park, CA." In *Structuring Diversity: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s on the New Immigration*, Lamphere,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 [12] Bard, Mitchell. "The Influence of Ethnic Interest Groups on American Middle East Policy." In *The Domestic Sourc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harles W. Kegley, Jr. and Eugene R. Wittkop, ed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8.
- [13] Castles, Stephen, and Gdula Kosack. *Immigrant Workers and Class Structure in Western Europ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Cerny, Philip G. *Social Movements and Protest in France*. London: Frances Pinter, 1982; Schmitter, Barbara Heisler, and Martin O. Heisler. *From Foreign Workers to Settler?* Beverly Hills, CA: Sage Publisher, 1986.
- [14] Cerny, Philip G. *Social Movements and Protest in France*. London: Frances Pinter, 1982.
- [15] Ireland, Patrick. *The Policy Challenge of Ethnic Diversity: Immigrant Politics in France and Switzerlan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16] [美]塞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难以抉择(汪晓寿,吴志华,项继权译)[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 [17] Bobo, Lawrence, and Franklin D. Gilliam, Jr. "Race, Socio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Black Empower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4, no. 2 (June 1990).
- [18] [美]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张华青,孙嘉明等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 [19] 参见 Peter A. Hall and Rosemary C. R. Tayl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 *Political Studies* (1996), XLIV.
- [20] Katznelson, Ira. *Black Men, White Citie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 [21] Weiner, Myron. "Security, Stability, and International Immigr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3 (Winter 1992/93).
- [22] Ross, Marc Howard.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Analysi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Rationality, Culture, and Structure*, Lichbach and Zuckerman, ed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23] Rosentone, Steven J., and John Mark Hansen. *Mobilization,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Macmillan, 1993.
- [24] Olson, Mancur.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 [25] Uhlaner, Carole J. "Rational Turnout: The Neglected Role of Group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3 (1989), pp. 390-422.
- [26] Cho, Wendy K. Tam. "Naturalization, Socialization, Participation: Immigrants and (non-) Voting." *Journal of Politics* (1999).

Theoretical Analysis in the West on Immigrant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Zhu Lu-min

(*Institute of Marxism,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The immigrant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study obviously belongs to the field of a multi-subject study. In the West, the study of immigrant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seems to focus on the factors affecting immigrants political action. These factors include: immigrants ethnic or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immigrants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the institutions of the states where immigrants live. The article initially generalizes the three analysis respectively.

Key words: immigrant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West; theoretical analysis

(责任编辑:彭大成)